

# 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

## ——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

赵玉中

(昆明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理洱海地区“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确立极大地影响、改变并重塑着他们对其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感知与诠释方式。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这一所谓“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学术书写为例,审视与检讨“民族”这一制度设计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

**关键词:**民族文化 “本质化”建构;白族;知识精英 “本主”崇拜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2-0060-05

在对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族群文化政治的研究中, Richard Handler 发现,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理论常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空间上有边界、时间上连续、性质则为均质的实体<sup>[1]</sup>。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看来,对“文化”的这种“本质化”理解,以及以人群的本质本源来界定人群族群身份的方式,通常是民族主义者用以建构其族群认同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以文化“本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土著主义”,业已成为全球性的文化政治标记<sup>[2]</sup>。

20世纪50年代以来,白族知识精英在“民族”这一概念范畴的主导之下,在大理洱海地区的地域文化中,选择、挖掘或重组一些文化要素,将其标记、诠释与建构为“白族”这一少数民族群体的“客观文化特征”,用以合理化其现实的民族身份。他们的诠释与建构虽远未将其民族文化整合而为一个逻辑严密、自成一体的均质化体系,但这一“本质化”建构的努力,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民众对其自我身份的感知,同时也重塑着他们的地域观念与族群认同意识。

本文拟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通过梳理“本主”崇拜这一所谓白族“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的标记、诠释与建构过程,来分析与讨论“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

### 一、“本主”崇拜:源于中原文化的地方习俗

对大理洱海地区“本主”崇拜的现代学术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其中,尤以徐嘉瑞的学术书写影响至为巨大。他曾依据《南诏野史》(王崧本)中“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五十七山神”的记载提出“此当为本主庙之起源”,“大理本主庙诸神在南诏时祀祭极盛,在统一六诏之后,主政者遂利用此种宗教,为统治之工具。”<sup>[3]247</sup>尽管他声称“本主为大理特有之宗教”,但却认为:“此种宗教,本羌族原始宗教。”<sup>[3]249</sup>并进而指出,“本主”崇拜这一大理“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亦可能是先秦以来楚地巫文化影响之下的结果。他说:

余曾调查现存大理本主庙七十所,作《本主庙考》。所谓本主,其神与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国殇等,极相似。此类神祇,非佛非道。其主祭者为巫,与《九歌》同。虽不能断其直受《九歌》之影响,然滇、黔、楚民族间交通频繁;……则大理所受楚文化之影响,远自庄跻,近迄隋唐,影响渗透,非一朝一夕之故也。<sup>[3]22</sup>

徐先生1895年生于大理的邓川,母亲是当地的“民家人”。1939年,他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4年,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之际,他应邀前往故乡大理为编纂大理的地方志作实地考察。次年,写成《大理古代文化史》一书。1949

收稿日期:2013-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云南大理洱海地区民间文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10BMZ03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理洱海地区白族民间文献(墓志铭与族谱)的历史人类学研究”(HZ201130)。

作者简介:赵玉中,男(白族),昆明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历史人类学。E-mail:zhao\_aaa@126.com

年,在方国瑜等人的鼎力支持下,该书最终得以由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刊印。方国瑜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大谈云南文化与中原汉人移民之间的历史联系,并明确提出“故云南文化之发展,乃自旁注入,而非当地兴起,知此始可以言云南文化史也。”<sup>[4]</sup>

两位先生的这种言说方式,显然是清末民国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在学术上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具体体现。在指出地方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之时,他们亦不忘强调云南地域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中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然而,1949年以后,在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中,徐先生的研究成果虽被反复征引,但他有关“本主”崇拜与中原文化之间历史关系的论述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最终,“本主”崇拜此一大理洱海地区的地域文化事项,在“民族”这一全新的概念范畴的主导之下,被切割、标记、诠释并建构而为白族这一少数民族群体“特有的”或“固有的”宗教信仰。

## 二、作为白族文化特征的“本主”崇拜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理洱海地区的“民家人”即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度框架下被正式地确立为白族。在随后白族史志的书写中,“本主”崇拜即开始被视作白族人民普遍践行的一种宗教信仰。

据1962年编印的《白族简史简志合编》载“在白族地区的绝大部分乡村里,都供有相当于村社神的‘本主’。这是白族人民一种较为普遍的宗教信仰。……本主最初可能起源于社神,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增添了新内容。南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以后,‘封十七贤,五十七山神’,本主就被奴隶主用来统治和奴役人民的工具。”<sup>[5]</sup>

实际上,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本主”崇拜因被视作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并没有成为白族知识精英进行民族身份建构的主流叙事。80年代以后,“本主”崇拜的研究才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相关的论文与书籍相继发表与出版。此前被认为“迷信”、“原始”与“精神鸦片”的“本主”崇拜,也在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民族文化的学术书写中,逐渐成为“中华博大文化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sup>[6]</sup>。

在将“本主”崇拜诠释与建构为白族“民族文化特征”的学术书写中,杨政业的研究曾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在他看来,白族最典型的民族文化的“根”就是“本主文化”。本主,即“本境福主”的观

念,在白族的民族意识中最为根深蒂固<sup>[7]</sup>。同时,他还声称,本主文化是本土产生的,而非外来文化变异的结果,也不是一般的原始宗教,正向人为宗教的高级阶段发展。其核心是祈雨水、求生存和丰收<sup>[8]</sup>。显然,他的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此前徐嘉瑞有关“本主”崇拜与中原文化二者之间渊源关系的讨论。

类似地,其他一些白族知识精英也认为,“本主”崇拜是“白族相异于其他民族的独有的宗教信仰”或“白族固有的一种原始宗教,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在南诏时期已成雏形或已经盛行<sup>[9]</sup><sup>[10]233-238</sup>。

为进一步将“白族”这一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民族制度框架下的地位合法化,1990年,詹成绪曾撰文指出,本主崇拜具有一般宗教组织的雏形,与封建迷信有明显的区别。建议通过自治地方的立法程序,将白族的本主崇拜定为白族的民族宗教<sup>[11]</sup>。

“本主”崇拜更在此后各类有关民族文化旅游的宣传中被进一步确认,并最终“约定俗成”地成为了白族族性的典型特征之一。然而,对民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化”的想象与建构,已经并正在深刻地改变与重塑着广大白族民众对其族群身份及其历史文化的感知。如曾有学者提到,远在湖南桑植地区的白族,近年来已将其“上启祖奉祖先”的祭祖词更改为“上启祖奉本主”,原因仅在于他们中有人在考察过大理的白族文化之后提出,桑植白族的“祭祖”应该就是大理白族的“祭本主”,于是便对祭祖词作出了上述更正<sup>[12]</sup>。

尽管如此,在将民族文化“本质化”的建构过程中,白族知识精英至今仍难以合理地解释民间及历史文献中各种有关“本主”的“歧异”叙事。

## 三、“歧异”的“本主”叙事 “土主”、“本主”与“增尼”

由于大理洱海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进程,致使其承载着不同的“国家”传统。在其地方传说与民间文献中,常充斥着各种“歧异”的地方叙事。白族知识精英在其民族文化的学术书写中也因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考诸云南地方史志,“本主”这一汉语称谓的出现非常晚近,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白族文化的知识生产中,“本主”崇拜的起源常与南诏、大理国的王权历史勾连在一起。比如《南诏野史》中提及的“山神庙”,即往往被视为“本主庙”。而较之“本主”这一汉语称谓,“土主”一词的出现更早。即

使如此,有关“土主”的最早记载,亦仅见于元代张道宗的《记古滇说集》:“蒙氏威成王闻知,乃亲幸于滇,册杨道清为‘显密圆通大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圣像,曰摩诃伽罗。”<sup>[13]</sup>

依照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起源的学术书写逻辑,上古时期的“村社神”,在南诏(738—902年)兴起之后便成为了“山神”,而见于文献记载的“土主”则是今天的“本主”,或在元代已十分盛行的“土主崇拜”就是明清以后白族“本主信仰”的前身<sup>[9]177-196 [10]233-238</sup>。施立卓则更进一步指出,明清之际白族村落的保护神称为“土主”,直至光绪年间才出现“本主”的称谓。而在清末民初年的本主庙中,就不再有土主和本主的区分,凡社神均一律称为本主,土主之称消失<sup>[14]</sup>。

不过,据笔者近年来对洱海地区民间文献的研究及相关的田野调查,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土主”与“本主”之间的这种“承继”关系远非如此简单。

据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经庄本主神庙碑记》载“即吾村护国持灵景帝神庙,建立由来旧矣,……爰是合村有古碓被水冲埋,……捐资重建,并设立磨于其旁,以作本主坛遗之助,以为庇佑之图。”<sup>[15]560</sup>依此,至迟在嘉庆年间大理就有“本主”及“本主庙”的汉语称谓,而非如施立卓所言“至光绪年间才出现”。1944年时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的郑天挺参观大理太和村的本主庙后,在其日记中曾做了这样的记录“本主殿皆三楹,本主居中。其左侧祀土主,蓝面、六臂,手各执一物,俗称伽蓝神。余疑即密宗之玛噶拉。本主各庙不同,而土主则一,亦地方之特俗”<sup>[16]</sup>。据此,迟至在20世纪40年代,“土主”与“本主”仍祀于同一本主庙,“本主”为主神,“土主”伽蓝神<sup>①</sup>则作为配神奉祀,“土主”之称并未消失。

20世纪30年代末在洱海地区做本主调查的Carl H. F. Liu也发现,“土主庙”的说法在当时仍较普遍,但“土主”仅是“本主”的变体,已没有“本主”常用<sup>[17]</sup>。显然,按他的理解,“土主”与“本主”实指同一神灵,所不同者,称谓而已。对此,日本学者横山广子曾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解释,即“本主”不过是大理的白族为了离开贬义的“土”范畴,靠拢汉文化,将“土主”改头换面的结果<sup>[18]</sup>。

问题是,据1982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普查,昆明4区4县城的132座“土主庙”都还奉祀大黑天神“土主”<sup>[10]75-78</sup>。那么,何以昆明人至20世纪80年代都不愿离开贬义的“土”范畴?为何云南

南华县及四川盐边县的白族至今仍将其村落的神庙称为“土主庙”?<sup>[12]</sup>这或许只能说明,大理洱海地区在元明以来的儒家化进程中可能有其地域的特殊性。如据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南经庄重建本主祠碑记》载“自明洪武初,诏天下,每令百户立一社,为民间祈报之所。……中供奉本主护国安邦持灵景帝,并本主娘娘。左供伽蓝土主、观音老祖,右供新王太子。”<sup>[15]660-661</sup>为何此时大理的“民家人”仅将“本主”崇拜的起源溯至明初洪武皇帝建里社的诏令,而非一般如白族知识精英所认为的南诏、大理国的宗教制度?在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过程中,这类“歧异”的民间叙事或被有意地遮蔽了。

然而,文化事项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施立卓曾不无大胆地提出,土主(本主)崇拜其实不独白族所有。他说,查诸省外方志,土主崇拜在西南各地古代较为普遍,尤其是四川<sup>[14]</sup>。类似地,即使声称“本主的观念在白族的民族意识中最为根深蒂固”的杨政业,亦在个别地方谨慎地提到“尤其在大理地区”,白、汉、彝族“他们都信本主”,因此在本主的研究中“要注意民族团结的关系”<sup>[6]</sup>。

显然,土主(本主)崇拜这一地域性的文化事项,与地域人群的族性无关。然而,正是这一看似简单的事实却给致力于将“本主”崇拜标记、诠释与建构为“民族文化特征”的白族知识精英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使他们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另外,在大理洱海地区,“本主”崇拜的民间实践者之“本主”的观念与知识精英对“本主”崇拜的诠释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当地人常用白族话将“本主”亲切地地称为“增尼”或“老谷尼”(即“男性始祖”),显示出“本主”带有明显的祖先崇拜的特征。同样,当地人所崇奉的“本主”,大多并非是知识精英所认为的南诏、大理国的王侯将相。如据张锡禄等人在1988至1990年间对大理市境内所有白族聚居的自然村(街)的调查,本主神中以唐征南将军李宓的部将居多,多属外省籍。另外,当地村民大都讲不出本村本

① 在大理洱海地区,民间常将“大黑天神”称为“伽蓝神”,并有“在寺为伽蓝,在山为山神,在庙为本主”的说法。大黑天神,即“摩诃伽罗”,原为印度教三主神之一的“湿婆神”。被佛教吸收后,成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在汉传佛教中则被称为“伽蓝菩萨”。从当下洱海地区本主庙的祀神格局来看,伽蓝神多作为配神塑在本主神的左侧。

主的名字,本主的生日可以改,本主也可以根据需要换掉<sup>[19]</sup>。类似的发现亦可见于其他一些基于田野调查的论文<sup>[20-21]</sup>。

显然,对于“本主”崇拜的民间实践者而言,可以更换的本主及其生日、说不清名字的本主以及本主神谱中众多的汉族官吏,似可说明“本主”谱系是地方社会中的各村落赖以诠释其日常社会关系及历史文化的—个灵活可变的叙事框架。只不过白族知识精英则更愿意将“本主”崇拜与南诏、大理国的王权历史联系在一起。显然,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先秦以来中原与云南边陲社会之间的历史交往,同时,也完全忽视或否认了元明以来大理在儒家化过程中的各种文化变迁与文化创造,在某种意义上简化或割裂了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

#### 四、民族文化“本质化”建构的理论困境及社会文化后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白族历史文化的书写中,学者们往往“把现在的白族当作研究上的出发点(或历史上的终结点)。”<sup>[22]</sup>

如前所述,作为白族“特有的”或“固有的”“本主”崇拜,它的起源与形成也就被当然地追溯至白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即一般所认为的南诏、大理国时代,而且“本主”崇拜在当时也“必然”是一个族群区隔的文化标记。民族文化的“叙述”就这样被放置在了一个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其架构是历史的,背景却是社会学的<sup>[23]</sup>。

显然,这种以追寻事物的本质、本源来界定事物的“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不仅忽略了事物内部的差异性及其随着时间的各种变化,也无视事物与外部的交流混合而使其属性模糊不明的事实。

近来的文化理论研究表明,文化(cultures)本身并非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文化也并非是指某些具体的“事物”(things)。换言之,所谓“文化之间的边界”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模糊化或不断迁移的状态之中。这就使得在界限似乎分明的各意义体系的世界中,“离心化”(off-centeredness)往往是普遍的存在状态。进而,“文化”也就被视作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而每个群体的“文化”仅是这个“连续统”中的一个“际体系”(intersystem)而已<sup>[24]</sup>。依此理解,被一人群所主观认定的、基于某些客观文化特征的“族群边界”,无非只是人们在这一“连续统”之中“任意”切下的一道线而已,因为语言、体质、文化在人群间常有同有异,相似到哪一个程度就是一

个族群,相异到哪一个程度就不是一个族群,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sup>[25]</sup>。

美国人类学家 Louisa Schein 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就是一个“生产和组织”文化差别的制度框架。与其说“客观文化特征”是证明“民族”存在的科学依据,还不如说是“民族”这一制度设计首先决定了“民族文化”被标记、诠释与建构的方式<sup>[26]</sup>。

在民族知识精英看来,“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即根基于其“与众不同”的文化,或“永恒不变”的“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对民族文化的这种想象与建构,虽然一方面合理化了当前的制度框架,但另一方面,却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象征性地强化或固化了族群之间的边界,即以“文化”之间的边界来说明或证明现实政治边界的合理性。而全球化时代对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强调,则更放大了人们对民族差异的想像,强化了人们保留民族身份区隔的心态。因此,“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已日益成为一种反趋同论的话语,进而可能成为“他者”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sup>[27]</sup>。

#### 五、结语

尽管早在20世纪40年代,徐嘉瑞即提出大理“特有的”本主崇拜实际上是先秦以来中原文化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地方习俗,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赋予,却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对其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感知与诠释方式。在随后有关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书写中,白族知识精英即在“民族”这一概念范畴的主导之下,将本主崇拜这一地域社会中共有的文化事项,切割、标记、诠释并建构而为“白族”这一少数民族群体的“典型”文化特征。显然,对民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化”想象与建构与民族知识精英力图在制度框架下确认其“民族”的身份有关。不过,这种想象与建构,不仅难以解释各种“歧异”的地方叙事,亦使他们陷入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书写逻辑,即“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文化”的独特性,而“文化”的独特性又进一步证明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某些“不变的”文化特征即是“民族”的所有物。

不过,这种对民族文化“本质化”的想象与建构却产生了“不道德的”社会文化后果。首先,遮蔽了先秦以来中原移民与文化对云南边陲社会的影响。其次,忽视或否认了元明以来大理洱海地区在儒家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与文化创造,进而在某种意义上

上简化或割裂了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再次,以人群的“民族”身份来切割地域社会中共有的文化事项,不仅不能使人们获得对地方社会实际历史过程的正确理解,也会在同一地域社会的不同族群或“民族”之间造成竞争与冲突。最后,旨在强调差异的这种反趋同论的书写方式,或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成为国家之内的少数“他者”进行权

力斗争的工具。

因此,在今后有关“文化”的学术书写中,如何超越“民族”这一概念范畴,在理论或学术范式上妥善处理“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获得对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历史联系的正确理解,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Handler.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Quebec [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 [2] 张兆和. 梁聚五关于苗族身份认同的书写——近代中国少数民族以汉语表述我族身份认同的个案研究[G]//“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会议论文集. 成都:西南民族大学, 2007.
- [3]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 [4] 方国瑜. 大理古代文化史序[M]//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3-4.
- [5]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 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 白族简史简志合编(送审稿) [M]. 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62: 16-17.
- [6] 杨政业. 本主文化论[M]. 大理:大理州文化局(内部资料), 2000: 272-278.
- [7] 杨政业. 大理文化管锥[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 163-171.
- [8] 杨政业. 白族本主文化[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6-7.
- [9] 云南省编辑组. 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57-176, 177-196.
- [10] 张锡禄. 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 [11] 詹成绪. 试议将白族的本主崇拜定为民族宗教[J]. 云南社会科学, 1990(3).
- [12] 董建中. 白族本主名称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10).
- [13] 李春龙. 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 10.
- [14] 施立卓. 白族丛谈[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150-157.
- [15] 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大理古碑存文录[G].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 [16] 郑天挺. 大理访古日记[M]//赵寅松. 白族文化研究 2002.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10-53.
- [17] Carl H F Liu. A Study of the Religions of Hsichow, Continued [J]. The Chinese Recorder, 1941, 72(6): 302-308.
- [18] 横山广子. 离开“土”范畴:关于白族守护神总称的研究[M]//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东亚社会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09-120.
- [19] 张锡禄. 大理市白族本主神崇拜调查报告[M]//赵寅松. 白族文化研究 2001.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460-518.
- [20] Jeffrey Howard Schmitt. Uprooted Referents: An Ethnography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Bai Nationality of the Dali Plain, Yunnan Prov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7: 185-233.
- [21] 何永福. 从白族本主神祇分类看本主崇拜心理的发生[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3(5).
- [22] 林谦一郎. 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D]. 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5: 8.
- [2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93.
- [24]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 [25] 陈庆德. 试析民族理念的建构[J]. 民族研究, 2006(2).
- [26] Louisa Schein.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M].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 [27] 石之瑜. 族国之间——中国西南民族的身份策略[M]. 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305-319.

(责任编辑 程 苹)